

音釋梵書與中國古音

銅和泰著

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

鋼和泰 (A. von Staël-Holstein, Ph. D.)

有許多史學家以為中國民族的老祖宗曾住在圖蘭(Turan)平原,包括現在俄屬的突厥斯坦及中國的新疆。德國著名地理學者李虛賀芬(Richtofen)一據羅巴赫(Paul Rohrbach)說,他也是主張這一說的一曾說,那塊地方不但是中國民族的發源地,還是印度歐羅巴民族(Indo-European)的老祖宗的老家呢。他以為冰期之後,這一帶地方忽然變乾燥,遂使圖蘭平原的大部分居民不得不分散出去,中國民族的老祖宗往東來,印度歐羅巴民族(以下省稱“印歐民族”)的老祖宗向南方西方到印度,西亞細亞,及歐羅巴去。

這個假設至今還不曾證實,但近年頗得着一點新資料。近年新疆發現了用幾種印度歐羅巴文字寫的文件,內中有一種確是歐洲式的印度歐羅巴文字,(以下省稱“印歐文字”)與亞洲式絕不同。那種民族若不是從歐洲遷過來而一路不幸沒有遺跡可尋的,也許是從最古時代一直留遺下來的。但這還不能證實中國民族的遠祖宗曾和印歐民族的遠祖同住一地。

但這個假設也許可以從比較言語學裡得着證據。如果我們能在印度民族的“原始語言”和中國民族的“原始語言”裡尋出許多相同的字來,我們就可以推想,這兩系的民族的老祖宗大概是相去不遠的了。那些相同的字,大概只可以算是彼此傳借來的字(Loan-words)。以我所知,至今還沒有人說中國語是印歐語是同源的一語的。

(47)



29557

我們若想尋出中國民族的遠祖與印歐民族的遠祖有無相同的字，我們必須仿照西方學者推求印歐民族的“原始語言”的方法先把中國民族的“原始語言”推求出來。在那“原始中國語”推出之前，一切語言上的相似之點只可以看作偶然的。

但我在這裡可以舉出幾個相似的例——內中有兩例是雷興 (Lessing) 教授(前任北京大學德文學教授)指出的。

(例一)犬。言語學者比較印歐系的各種語言，斷定“原始印歐語”裡狗字的音是 Kuan。現在北京音讀“犬”字如 Ch'üan, 福州讀如 K'öing, 客家話讀如 K'en, 朝鮮讀如 Kyön, 日本讀如 Ken, 安南讀如 K'üen。

(例二)牛。“原始印歐語”裡牛字的音必是 Go 或 Gu。北京讀牛如 Niu, 廣州讀如 Ngau, 客家話讀如 Ngiu, 溫州讀如 Ngau, 寧波讀如 Ngiu, 安南讀如 Ngü, 日本讀如 Giu。

(例三)蜜。“原始印歐語”裡蜜字的音必是 Məd, 北京讀“蜜”如 Mi, 廣州讀如 Möt, 客家話讀如 Mit, 日本讀如 Mitsz, 安南讀如 Möt。

但我們不能從這些相似的字音上就下什麼結論。我們現在的知識不充分，只能暫時看作偶然的巧合。等到我們把“原始中國語”推出來了，或推出大部分來了，我們方才可以有可靠的結論。

從發音學上重新構成“原始中國語”，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指定中國民族與印歐民族最初的一個老家。但中國古音的推求也可以幫助史學家研究稍晚的時代。研究印度史與中

歷史的人往往在中國史冊裡尋出最可信的材料來源。司馬遷的史記供給了他們許多重要的知識；史記以下的諸史也很有用處。但這裡面往往有一個大困難：中國史書裡用來譯外國地名的漢字，我們常常不知道他們應如何讀法。若漢字的古音都知道了，這種史料就更有用了。

“原始中國語”的推求，不是容易的事。要想推求出來的“原始中國語”也有“原始印歐語”那樣正確，怕是不可能的了。這是因為兩層大困難：第一，中國文是用象形會意字寫出的，不是像印歐系語言那樣用純粹音標寫出的；第二，和中國語最接近的幾種語言——西藏語，緬甸語，暹羅語——不幸都沒有很古的文書。

研究各時代的漢字如何讀法，有三個重要的材料來源。第一，中國各種方言裡與日本安南朝鮮文裡漢字讀音的比較研究。第二，古字典（如唐韻之類）裡用反切表示漢字的讀法，古韻表可以考見韻母的分類。第三，中國字在外國文裡的譯音，與外國字在中國文裡的譯音。

在那些外國字的漢文譯音之中，最應該特別注意的是梵文的密咒（Mantras）一類。這些梵咒（亦稱“陀羅尼” Dhāraṇī，譯言“總持”）曾經用漢字譯音，使那些不懂印度文的人也可以依漢字念誦。釋迦牟尼以前，印度早已把念咒看的很重要；古代的傳說以為這種聖咒若不正確的念誦，念咒的人不但不能受福，還要得禍。梵文是諸天的語言，發音若不正確，天神便要發怒，怪念誦的人侮蔑這神聖的語言。這個古代的迷信，後來也影響到佛教徒，所以我們讀這些漢文音譯的咒語，可以相信當日譯音選字必定是很慎重的。因為咒語的功効不在他的意義，而

在他的音讀，所以譯咒的要點在於嚴格的選擇最相當的字音。況且這兩三千年以來，梵文的音讀不曾經過變遷。這幾層理由使我們明白這些梵咒在言語學上的大功用。只要我們能尋出梵文原文來和音譯的咒語對照，便可以知道那些漢字在當時的音讀了。

我們僥倖保存着許多陀羅尼咒，不但有漢文，還有印度原文。假如我們在一篇咒裡見梵文 Vividā 的漢文譯音是“尾尾馱”，我們就可斷定當時當地的人讀“尾”如 Vi，讀“馱”如 d'a。如果當時沒有一個單字可以表出梵文 d'a 的音，那原譯的人早已用“二合”的常法，用兩個漢字來譯這一個音了。他不用兩個字，而用一個“馱”字，可見當時的“馱”字必不讀今音，而讀 d'a 之音。梵咒的音讀因為有宗教的性質，故在中國古音學上的價值比一切非宗教的譯音（如地名人名等）格外重要。此外，這些咒還有一個優點：譯者的姓名與年代往往都有記載可考，不比那些不帶宗教性質的地名人名大都是不知起於何代的。況且平常的外國地名人名至多不過是幾個字，而一篇陀羅尼裡有時竟有幾百或幾千個字的。這一點更可見這些梵咒的價值了。

當宋朝初年（太宗真宗時，約當西歷紀元一千年），有一個印度和尚，叫做法天（後改名法賢），翻譯了一些短的梵咒，還翻譯了一些很長的宗教頌詩；這些頌詩大概有和咒語同等的價值，故也是嚴格的翻譯的。法天譯的梵書，有些的梵文原本是已尋着的了，有些還不曾尋着原本，但已經有學者根據西藏文的譯本，把梵文的原本逐字推測出來了。那些已尋着原本的梵咒之中，有一篇叫做“三身梵讚”，我在十年前曾用梵字原本來校

對校對的結果曾在俄京發表過。

那些沒有梵文原本的譯本之中，有三篇頌詩：

- (1) 健椎梵讚佛教大詩人馬鳴(Aśvaghoṣa) 著。
- (2) 七佛讚頌伽陀，著者失名。
- (3) 佛說文殊師利一百八名梵讚，著者失名。

這三篇的梵文，大概是已經失傳了。但這三篇都有西藏文直譯意義的本子(不是譯音的)我用藏文的義譯本，和漢字的音譯本對照着，遂把三篇的梵文原本都推出來，曾在我的一部“Kien-Ch'ui-fan-tsan”(St. Petersburg, 1913)裡發表過。

我們把法天的音譯本和梵文對照着看，就可以知道他翻譯梵音的方法實在是非常精密的。他連那極微細的區別都不肯放過。例如梵文字母‘𑖀’與‘𑖁’(Sa 與 Śa)的區別是很難分辨的；但法天却分的很清楚。他用‘沙’字表前者，‘設’字表後者。又如‘𑖃’母(Ja)用‘惹’字，而‘𑖄’母(J'a)用‘昨賀’兩字的‘二合’，可見法天當時找不出一個單字可以代表J'a的梵音，故不得已而用這個‘二合’的法子。

法天的時候大概也沒有Ra的音，所以他用當日讀La音(麻韻)的‘羅’字，加上‘口’旁，變為‘囉’字，代表Ra音。全書的La音都用‘羅’，而Ra音都用‘囉’。又如Maya譯為‘摩野’，而Mya譯為‘摩野二合’；這裡‘二合’兩個字是一種符號，表示前面兩個字應該怎樣讀法。這種和別種符號字，法天和別的譯者都常常使用。

法天譯音的非常精密，我們可以從他翻譯諸佛名號裡更可以看出來。他在每章的題目上，仍舊用習慣的譯名；但他在每章的本文裡，却另用精確的新譯音。例如頌讚釋迦牟尼佛

的一章的標題，仍舊是“釋迦牟尼”的舊名，使念咒的人知道這一章是讚誰的。但那一章的本文裡，他就用那不正確的譯音了，他用的是“設枳也(二合)母鞞”。我們把七佛的名號列表如下：

標題的佛名(舊譯)	咒文內的佛名(新譯)	梵文
毗婆尸	尾鉢始也(二合)	Vipaśyī
式棄	式企	Śikhī
毗舍浮	尾濕嚩(二合)部	Viśvabhū
拘留孫	訖囉(二合)矩瓔捺	Krakucehanda
迦諾迦牟尼	揭曇揭母額	Kanakamuni
迦葉波	迦捨鉢	Kāśyapa
釋迦牟尼	設枳也(二合)母鞞	Śākyamuni

上文說過，這些咒願本來帶着宗教的性質，況且印度教徒與佛教徒對於這種經典的梵音都特別注意。這兩層事實可以使我們相信當日用漢字譯音的時候必定是很慎重的。我在上文舉的一些例，大概可以證實這一點了。現在我要把我研究法天譯本的結果，和近日學者從別方面研究漢字古音的結果，作一個比較。

從別方面研究漢字古音的要算瑞典學者高爾格倫(Karlgren)教授的切韻的研究為最重要的了。高爾格倫教授把他研究切韻的結果，著成一部大書，中國音韻學研究(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, Leyden and Stockholm, 1915-1919)；這部書已出版的部分已有七百頁了，但還不曾出完。高爾格倫教授頗得力於法國學者伯希和(Pelliot)及其他歐洲學者研究的結果。除了

音 譯 梵 書 與 中 國 古 音

這部大書之外他還在通報(卷十九,第二期)上發表了差不多一千個中國字的古音,用羅馬字注明他們的讀法。他說,這個表裡的音讀可以代表中國一千三百年前(隋代)的一種方言的發音。這個時代固然比法天的時代要早四百年。然而這部較早的字典的研究結果,和那較晚的梵讀譯音比較起來,却也還有趣味。例如“際”字,北京人今讀如 Ch'a, 法天用來譯梵音 d'a; “吒”字北京人也讀如 Ch'a, 法天用來譯梵音 ta。高爾格倫教授研究切韻的結果,正和法天的用法互相印證。據他說,“茶”字當日讀如 d'ia, 而“吒”字讀如 t'ia。

下面附的一個表,也是同樣的例。我的書裡,大約有三百個字;但法天譯的各種梵書裡還不止此數。下表所列,不過是略舉的例:

	北京音	法天	Karlgren	寧波音
澁	sê	s(a)	siēp	sah
塞	sê	s(a)	sök	sah
沙	sha	sa	ʃi a	so
舍	shê	sa	ʃja	shō, sho, so
尸	shih	si	ʃi	sz
史	shih	gi	ʃi	sz
輸	shu	su	ʃju	shī
數	shu	su	ʃju	sa, shī
且	tan	tan	tân	taan
淡	tan	d'am	d'am	daaŋ
底	ti	ti	tiäi	ti

音 譯 梵 書 與 中 國 古 音

	北 京 音	法 天	Karlgren	寧 波 音
帝	ti	ti	t'iai	ti
地	ti	d'i	d'i	di
弟	ti	d'i	d'ai	di
都	tu	tu	tu	tu
度	tu	d'u	d'uo	du
企	ch'i	k'i	k'jie	c'i
契	ch'i	k'ai	k'iai	c'i, c'ih
建	chien	kan	kjan	cien
健	chion	g'an	g'jan	djion
楨	chih	ki	kjie	'tsz
致	chih	ti	t'i	chi
擬	i	gi	ngji	ngi
伊	i	i	i	i
曳	i	yi	jai	yi
畔	pan	b'an	b'uân	bouñ
半	pan	pan	puân	pouñ
鼻	pi	b'i	b'ji	bih-
閉	pi	pi	piüi	pi
頗	p'o	p'a	p'ua	p'ou
婆	p'o	b'a	b'ta	bou
布	pu	pu	puo	pu
部	pu	b'u	b'uo	bu

此外我還可以舉許多例來表示法天的譯音和高爾格倫

教授研究切韻的結果，又和現在寧波的方音，大致相符合。（譯者按，此處言法天用的方言與寧波今音相合，不過是說寧波音比現在北京音爲近古。讀者不可太拘泥）。高爾格倫教授和法天不同之處，一部分大概是因爲隋朝與宋朝中間相隔四百年；一部分也許是韻書用漢字作反切，往往有時地的差異，故解釋時未免容易錯誤。例如“龍”字，法天讀如Ru，沒有鼻音的收聲；但高爾格倫教授讀如Lung，却有鼻音的收聲。我們研究回鶻（Uighur）文譯的漢音，“龍”字也讀如Lu，不讀如Lung；況且回鶻文讀別有鼻音收聲的漢字，却又狠分明，例如“僧”字，正譯爲Song。況且西藏人也叫“龍”作Lu，而不作Lung。所以我想法天用的方音裡，“龍”字一定是讀如Lu，不讀如Lung。

“囊”字法天讀作Na，不像今音讀如Nang。高爾格倫教授讀“囊”爲Nang，與今音正同。但法天讀“龍”字如Nang，與今音“囊”字相同，仍保存着鼻音的收聲。（譯者按，“龍”變爲Lu，“囊”變爲Na，與“儂”變爲“奴”，“阿儂”變爲“阿奴”，正同一例。此必是宋時確有這個變遷。法天初至中國，先在鄜州譯經，後在蒲津譯經，最後乃到汴京。同他共事的法進，也是河中蒲州的和尚。我疑心這個變遷，是當日西北方言裡的變遷，因爲南方語言雖有吳越語裡n收聲的字的變化，但Ng收聲的字始終不曾完全變爲純元音的收聲）。

我盼望讀這篇短文的中國學者能承認法天音譯的梵咒，即使不够改正那從字典韻書得來的材料，至少也有參考互證的價值。此外，還有許多梵文的音譯也許比法天還有更大的用處，因爲有些譯本是三國時吳國的，有些或真是後漢的。如

果有人把那些譯音也都像法天的梵咒那樣研究分析出來，我們定可得很重要的結果。

我雖然不曾仔細研究過那些更古的譯本，但我偶然翻看他們，已發現了一些很妙的結果。例如“隨”字像是用來譯 Vi 音，“葉”字好像讀如 Ssab，“越”字好像讀如 Vat。

我很盼望中國學者將來能注重這一類的古音材料，把這些古譯音研究出來，不但中國音韻沿革史可以得許多旁證，歐洲研究印度史和中亞史的學者，也可以得益不少了。向來歐洲的學者已得了司馬遷，法顯，玄奘等人的極大幫助；如果中國學者能在這一方面再給他們一點幫助，他們更要感激了。

十一，四，九，胡適譯。



